

□ 石志刚

民间谣谚作为百姓对生活的洞悉与总结，以极具特色的鲜明的民间语言，反映了百姓的真实心声、概括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传递出对善的追求与对恶的贬斥。其中，以对贪腐的嘲讽和表达反贪诉求的谣谚最具特色。

勾勒贪腐众生相

封建社会中，人治色彩较为浓厚，贤君良相统治时期，会出现相对较为清明的社会氛围；暴君奸臣统治时期，则又呈现出腐化堕落的社会景观。从古代谣谚角度归纳一下腐败类型，描述一下腐败众生相，显得尤为必要。首先来看权钱交易者。政治秩序越无序，腐败滋生得越快。金钱可以换来权力，权力可以换来金钱，这种权钱交易刻画出卖官者的狂妄和买官者的癫癲。东汉末年，朝廷腐败的特征就是权钱交易。当时崔烈用五百万跟汉灵帝买相当于宰相的职位，权钱交易实现后，汉灵帝非常遗憾地说自己手太软了，没有卖千万的价钱。这种权钱交易的行为扭曲了官员价值观，破坏了政治生态，使得社会朝着更加无序的方向发展。东汉末年就出现了这样的谣谚，“举秀才，不知书；

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就是权钱交易后形成的不良政治格局。

其次来看利用权力追求奢靡。贪官敛财的目标是为了享受和挥霍。明代部分地方官将贪腐所得，除存留一部分孝敬上司外，其余的都用来挥霍享乐。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谣谚：“知县是扫帚，太守是奋斗，布政是叉袋口，都将去京里抖。”另外，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类型也层出不穷，谣谚中都有反映。这些贪污敛财的众生相不仅使得贪腐者丑态毕露，而且这种贪腐行为还对吏治、社会和国家危害极大。

揭示贪腐大危害

腐败是一颗毒瘤，如果一个国家长了这颗毒瘤，不去及时根治，就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个灾难具体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

从政治角度讲，腐败会导致公共权力滥用和腐化。北宋末年的大贪官、“六贼”之一朱勔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敛财，为个人纵欲享乐提供条件，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奴许愿封官赐爵，其中受金带者达数十人。民间谣谚说：“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朱勔的腐化堕落侵蚀了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危害了政权的巩固和维持，是北宋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

从经济角度讲，腐败会导致直接的经济损失。清代大贪官和珅，是清代以“贪鄙成性”而被诛杀的最高级别官员。嘉庆亲政之日大诛和珅，得到百姓的广泛民意支持。当时百姓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样的谣谚之说。按照梁启超的估价，和珅共贪污敛财达八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十多年财政收入总和。

从社会角度讲，腐败会破坏社会公平和公正。北宋末年贪官王黼公开出售他所掌握的官职。老百姓为他的

卖官行径编了顺口溜：“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这种权钱交易加重了冗官现象，使得徽宗朝成为北宋历史上官员数量最为冗滥的时期，也加剧了社会不公平与不公正，使得没有才学的人上位，有才学的人没有平台发挥作用。

传达反贪腐理念

百姓对贪腐的痛恨在民间达成共识，这种共识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在影响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官员这支队伍方面，反贪文化打下深深的烙印。封建社会中，郡县治，天下安，地方政府官员执政效果很大程度上受其执政理念所影响。如果一个地方官头脑中持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思想，并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一己私利而实施腐败行为，会加重百姓负担、引起社会情绪不满、严重销蚀统治基础。如果一个地方官员头脑中持

有反贪意识、清官理念，并且将权力最大限度地用于给老百姓办实事上，会赢得百姓称赞、减少社会不满情绪、巩固统治者权力基础。

百姓在谣谚中所表达的反贪意愿渗透到官员队伍中，对于官员提升反贪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封建社会，悬于地方政府公堂之上的匾额，如“明镜高悬”“公正廉明”等就是群众盼望“清官”的表达。除了匾额之外，还有古代县衙厅壁门楣，许多官员自己就表达了对腐败的痛恨及对清廉的向往。明代弘治年间吏部尚书王恕在官衙门口贴出一副对联：“任于朝者，以馈送及门者为耻；任于外者，以苟且入都者为羞。”清代有一个地方官叫陈景登，在衙门口贴出一副对联：“头上有青天，作事须循天理；眼前皆瘠地，存心不刮地皮。”

当然，如果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头脑中有反贪思想，而且还将其付诸实践，这样就会减少、消除贪腐行为，进而造福一方，王恕、陈景登

属于这一类。如果言行不符，头脑中有反贪理念，但实际上没有付诸实践，反而大肆收受贿赂，则成为官场“双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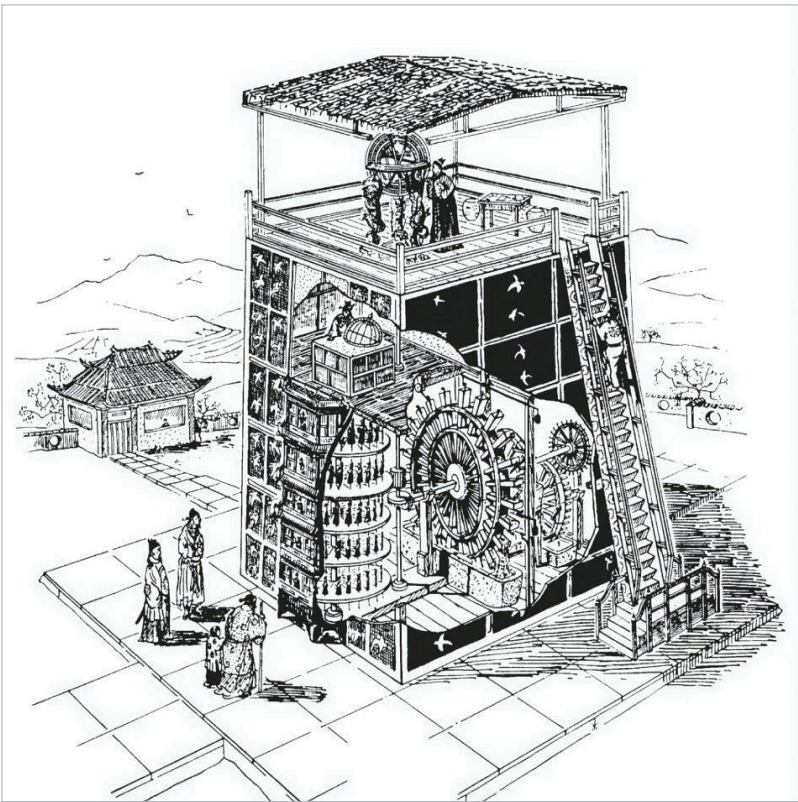
唐代仆射刘崇龟表面上以廉洁自居，而且还以粗茶淡饭招待同僚以博清廉之名，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他并没有做到清廉。在他死后，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记载：“家人鬻海珍珠于市。”这种奢侈品的出现恰恰证明了他的不清廉，或者说，他没有做到他所宣称的那种清廉，所以被当时的百姓“讥之”。晚清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把慈禧御赐的“清正廉洁”金匾送回家乡挂于李氏祠堂，作为光宗耀祖的宣传。没想到几天后，百姓在李氏祠堂大门上写了一副对联：“市屋千幢皆姓李，良田万顷属中堂。”这是民间对李鸿章“双面人”的揭露。十月革命后，在清理冬宫档案时，发现了档案库秘存的李鸿章在中俄密约签订背后收受道胜银行三百万卢布贿赂。在李鸿章办洋务、为官过程中，收受巨额贿赂。据容闳说，“李鸿章绝命时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从一个侧面可见他的贪腐。所以，一句“宰相合肥天下瘦”广为人知。

史 镜

有所思

苏颂的杰作

□ 陈良



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由苏颂主持制作的水运仪象台问世，标志着北宋科技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水运仪象台，是一座融浑仪、浑象和报时装置于一体的高台建筑，更是数学、力学、天文学和机械制造等多种科技的结晶。

据苏颂《新仪象法要》记载，水运仪象台系座底为正方形、下宽上窄的三层塔形结构，高约12米。上层置有巨大青铜动力发动浑天仪，中层是一封闭密室，内有自动旋转星象，下层设有报时装置和动力机械。报时装置由五层木阁组成，每层各有若干个持有铃或锣的小木偶，每到一定时刻就自动出来报时。在主塔内部，每层都有相应的机械装置，由底层流动的水不断使垂直的旋轮上的四槽交替盛水放水，循环不息，从而推动整个系统持续运转。

当时，只有皇帝和达官贵人才能观看水运仪象台，目睹者无不为之惊奇。对于它的精妙，苏颂颇自豪地记述道：日暮时分，一红衣木偶出现报时，越二刻又半，绿衣木偶出现，以示黑夜来临。至于守夜时间，又分五更。守夜开始，红衣木偶出现，此为第一更，其余四更出现皆为绿衣木偶。黎明时分，又一绿衣木偶出现报讯。到了日出，又由红衣木偶报时。

熙宁十年（1077年），苏颂奉命出使契丹，为契丹君主祝寿。契丹君主生辰正逢冬至，苏颂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发觉自己比预期的日子早了一天。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大宋日历与契丹日历相差一天，致使苏颂提前一天到达。契丹人问，两家历法哪个更准确。博学多才的苏颂巧妙应答：两家相隔一日由时差造成，大宋到子时即为明日，而契丹犹在亥时，契丹人信以为然。其实，苏颂心里也没有底，他知道历法正误只有通过实践检验。时隔十年，苏颂负责检验钦天监使用的浑仪，并受命制作新仪器。太平兴

国四年（公元979年），张思训曾制造水运浑象“太平浑仪”，后因机绳断坏，无人知其制法。苏颂访知吏部官员韩公廉精通数学、天文学，于是力荐韩公廉参与，组织一批能工巧匠，共同研制水运仪象台。其研制成功与使用，能够精准推算历法和测定时间，总算了却了苏颂的心愿。

元祐三年（1100年），宋哲宗赵煦去世，其弟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赵佶是一位极具艺术天赋的皇帝，酷爱书画奇珍异石，对天文技术毫无兴趣。于是，苏颂等人发明的水运仪象台不再受到皇家的重视与保护，它逐渐地成为无知之徒眼里的锈铜旧木，最终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

若干年以后，当利玛窦带着时钟到达北京时，明朝皇帝和大臣无不为西洋发明的玩意儿所震撼，以为它是举世无双的宝贝。若干年以后，安文思神父向康熙皇帝赠送一座时钟，它每小时鸣响并奏出悦耳的音乐。康熙十分欣喜，认为它巧夺天工，颇为神奇。同时，康熙也纳闷，如此灵巧之物，大清国何以做不出来呢？

其实，水运仪象台就是一座天文时钟，在它问世之日，欧洲人还是用水滴漏或沙漏计时，尚未发明机械钟。所以说，水运仪象台堪称世界上第一台机械计时器。然而，北宋之后的中国人不仅没对它进行改进与细化，反而把他搁置了。

从此以后，我们在天文学及钟表等领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其原因耐人寻味。在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一般人不能涉足的禁区，只有朝廷专职人员才有资格研究，因为古人相信世间大事与天象紧密相关，所以统治者不容许民间过问天文学，防止人们观察天象或星云泄露天机，危及王朝政权的稳定。因此，即使苏颂等人发明了无与伦比的天文时钟，如果得不到后来统治者的支持，其相关机理与制作技术

必定失传，形成后继无人的局面。再者，宋代文化教育非常发达，出现不少培养士子的书院，虽然培育了无数优秀文人士大夫，却难以造就出优秀科技人才。自隋唐开科取士之后，读书人的出路就是瞄准科举入仕，而科举考试内容仅限于人文学科，导致读书人重文轻“理”（自然科学），对自然科学研究不感兴趣。读书做官被视为唯一“正途”，更加强化社会文化心理偏好人文学科而忽视自然科学，搞自然科学研究对于读书人来说没有多大用处，从事器具制作被看作“形而下者”受到轻视。同时，在相当长时期，中国文化（包括科技）远比周边国家发达，也使我们缺乏科技创新动力。重文轻“理”渗透到集体无意识中，从而固化为文化心理与价值取向。到了明清，依然重复昨天故事，随着文字狱的禁锢，思想文化尚且裹足不前，科学技术更无进步可言。

而欧洲在中世纪已建成诸多知名大学，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并重，尤其是文艺复兴之后，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上都取得重大突破。故而，到了明清时期，别人能制作出精致的时钟，我们只有羡慕与惊奇，却造不出好时钟与之媲美。不要小看时钟，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计时工具，而是现代机器之母。因为时钟里的齿轮与螺丝是机械行业不可缺少的要件，其制作者也是科学仪器制造者的先驱。最早的全金属车床为钟表匠所造，也为钟表匠所用。后来的精密机床，作为现代工业的工作母机，也是欧洲钟表匠的首创。从这个意义上说，钟表孕育了现代大工业。

时过境迁，回想北宋时期苏颂等人创造如此杰作，我们不仅为之骄傲，也感到遗憾。不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若能正视过去问题并吸取教训，将来就不会有类似的遗憾。

一首诗中的唐朝对外开放

□ 高建新

唐王朝的强大和繁盛，是与其奉行的国策密不可分的。代宗朝（762—779年）诗人张惟俭《赋得西戎献白玉环》一诗，就颂扬了唐王朝的开放及平等的民族政策带来的四海统一，人心所向：

当时无外守，方物四夷通。列土金河北，朝天玉塞东。自将荆璞比，不与郑环同。正朔虽传汉，衣冠尚带戎。幸承提佩宠，多愧琢磨功。绝域知文教，争趋上国风。

诗开始两句“当时无外守，方物四夷通”说，唐王朝实行开放政策，交通畅达，方物来自四面八方个国家。唐王朝的强大得益于开放的国策，并在开放中成就伟业，彪炳千秋，所谓“大业来四夷，仁风和万国”（张袞《梁郊祀乐章·庆休》），唐王朝的开放和繁盛，吸引了周边众多的国家，就像大禹当年涂山盟会一样，有万国争相执玉前往。

“列土金河北，朝天玉塞东”两句说，唐王朝国土面积广大，北至金河以北、玉门关以东的各国也争相来朝。从太宗、高宗、武皇到玄宗，唐王朝不断拓土开疆，加强边防，疆域北抵金河以北，安北都护府一度设在哈尔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向西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行政管辖直达今天的中亚、西亚，在大宛、康居、昆墟、条支、朝鲜、波斯，均设有都督府、都护府；安东都护府、熊津都护府、鸡林都护府均设在今天的朝鲜半岛。诗人怀念“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太宗朝和“承平岁久，自开远门至番界一万二千里，居人满野，桑麻如织”的玄宗朝，认为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盛世。太宗、玄宗朝国家统一安定，敞开国门与四方交通：“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

膏粮，取给于道路焉。”即便是看似荒远的金河之北也分封土，玉门关以东的僻远之邦也入国朝贡，和平、富裕、繁荣的景象随处可见。

“自将荆璞比，不与郑环同”两句中，荆璞出自《韩非子·何氏》：春秋时楚人卞和在山中得一块璞玉，献给楚厉王、武王，王不识玉反断其左足和右足。到文王时卞和抱玉哭于荆山下，王使人剖璞，果真得到宝玉，名之谓“和氏璧”，后用以献和氏璧比喻一片赤诚。郑环，出于《左传·昭公十六年》：晋国的韩宣子有一玉环，其中一半在郑国商人手里，韩宣子向郑国国君请求得到，相国子产不愿意给，说，这不是公家府库保存的东西，寡君不知道。这两句诗是说，西戎所献白玉环如荆璞一样完美无缺，珍贵异常，与当年晋人所看重的郑环不能同日而语，何况白玉环本身包含了进献者的一片真情。

“正朔虽传汉，衣冠尚带戎”二句最有内涵，说的是“胡”文化对唐文化的影响。正朔，古代改朝换代时新立帝王颁行的新历法，后亦泛指历法。《史记·太史公自序》：“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这两句诗说，唐王朝的历法和文化虽传自于汉朝，但唐人的风俗好尚却明显地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唐人推崇“胡”文化，好胡食、胡乐、胡服，胡文化的阳刚大气、摒弃苛细，深得唐人之心，也与向上的时代要求相一致，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唐文化的开放和大度。

“幸承提佩宠，多愧琢磨功”两句说，西戎所献白玉环有幸获得手提胸佩的亲近，也不白费朝觐者花了许多功夫的精心打磨，表明了西戎对用作礼物的白玉环的郑重和用心。

结尾“绝域知文教，争趋上国

风”两句说，由于中华文化的巨大影响和魅力，即使是隔绝难通的边远地方，也渴望来到唐王朝，争相向文明大国学习，这也是德宗朝的毛谔“万里求文教，王春怆别离”所要表达的。历史上的西戎并不和东方的中国交通，由于西域的凿空和丝绸之路的开通，从汉朝开始交往渐渐增多。唐王朝建立之后，不断前来献纳贡品的西戎国家有百国之多。唐王朝体恤诸国地处僻远，朝贡不易，“视地远近而给费”。这两句以精练准确的语言指出了唐文化对“胡”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是丝绸之路畅通、繁盛带来的结果。当时，天竺、扶南、西凉、龟兹、疏勒、康国、高昌以及高丽、日本等，竞相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唐王朝频繁交往，并从中获取文化上的养分以发展壮大自己。

英国艺术史学者贡布里克奇先生说：“论地理，欧洲跟中国遥相间隔，然而艺术史家和文明史家知道，这地域的悬隔未尝阻碍东西方之间所建立的必不可少的相互接触，跟今天的常情相比，古大概比我们更要坚毅，要大胆。商人、工匠、民间歌手或木偶戏班在某天决定动身启程，就会加入商旅队伍，漫游‘丝绸之路’，穿过草原和沙漠，骑马甚或步行走上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寻找工作或赢利机会”，这段话可视为“争趋上国风”的形象注释。

张惟俭的这首诗是大唐繁盛的缩影，“上国风”如描如绘，可感可见，读来至今让人振奋不已。它告诉人们，无论古代还是今天，开放是强国的必由之路。要想赢得世界的尊重，就必须有大国风范，必须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并将其融入自己的血肉之中。

中华春秋

（上接1版）推动跨部门“双随机”联合检查，实现对企业“一次抽查、全面体检”。三是做好企业信息公示工作。全面建成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推进行政处罚信息的公示，实现工商机关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记于企业名下的归集率达100%。四是推进涉企信息归集共享和联合惩戒。落实《政府部门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工作实施方案》，确保年底涉企信息归集政府部门的总体覆盖率不低于70%。做好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管理，规范“黑名单”管理制度，提高失信联合惩戒的有效性。

进一步强化消费维权工作，

努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围绕消费者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以新消费、日常消费、农村消费为重点，创新消费维权机制，完善消费维权平台，加强消费环境建设，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一是完善消费维权工作机制。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等规定，着力解决制约消费维权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协调解决消费热点难点问题 and 重大消费事件。二是加强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和服务领域消费维权。加强流通领域商品质量专项执法，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抽检。加强服务领域消费维权，加大

对网购退换货、公用企业服务、修理和中介服务等经营活动中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三是进一步完善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维权便利化的需求为目标，完善在线投诉和处置功能，提高消费纠纷解决效率。四是大力支持消协组织履行公益性职责。支持消协组织深入开展比较试验、体验式调查、消费者评议、约谈重点经营者、提起公益诉讼等工作，充分发挥消协组织在消费维权方面的独特优势。支持消协组织开展有特色、受欢迎的群众性消费教育引导活动，营造良好的消费氛围。（作者系国家工商总局研究中心主任）